

朝鲜王朝时期汉学译书研究

全香兰

(鲁东大学 国际教育学院;东北亚研究院,山东 烟台 264039)

摘要:译书在韩国专指编写于朝鲜王朝时期的外语学习用书籍。论文着重介绍朝鲜王朝时期汉学译书的类型及其主要代表书籍,并在此基础上总结了汉学译书的特点与价值。汉学译书不仅保留着中国元代以来汉语白话的使用情况,也反映着汉语在朝鲜半岛作为第二语言的教育情况,无论从历史语言学角度还是汉语国际教育的角度译书都是不可多得的研究资料。

关键词:译书;朝鲜王朝;汉语教育

中图分类号:H1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8039(2020)06-0024-07

朝鲜王朝时期,随着新文字“训民正音”的颁布和实施,译学得到了空前的发展。译学,从字面上可以理解为“翻译之学”,其范围比较宽泛,而在韩国“译学”有其特定的内涵。据《韩国民族文化百科全书》的定义,译学指“朝鲜王朝时期六学之一,是外语学习、外语教育、外语研究以及翻译的学问”^[1]。译学包括“四学”,即汉学、蒙学、倭学、女真学(后改为清学),并以汉学为中心。朝鲜王朝掌管四学的机构是司译院,是国家专门的外语教育机构。司译院为了培养外语人才制定课程,并编写了大量的外语学习用教材,这类书籍韩国国语学界叫作译书,又叫译学书。这类译书通常在司译院的掌管下刊印推行,主要用于外语教育及选拔人才。译书根据其内容大体分为四大类:1. 韵书类;2. 直解类;3. 会话类;4. 辞书类。本文将具体介绍汉学方面的典型译书,并总结其特点及价值。

一、朝鲜王朝时期汉学译书的分类

(一) 韵书类

1. 《洪武正韵译训》

学好汉语首先要掌握的是汉字的正确读音。1443年“训民正音(原案)”创制之后,世宗王第一步着手的便是韵书的编写。当时在中国最为权威的韵书为《洪武正韵》,于是决定以此为标准编

撰《洪武正韵译训》,用新造的训民正音记录中国汉字的正确音值。为编好这部韵书,1445年申叔舟等学者奉命至辽东进行调研,十年后《洪武正韵译训》终于问世。该韵书对汉字音的记录分两种:一是《洪武正韵》所记录的音,叫做正音;二是申叔舟等观察到的中国北方音,叫做俗音。《洪武正韵译训》的正俗双音系统跟《洪武正韵》本身的成书背景有直接关系。《洪武正韵》成书于洪武八年(1375年),是以中原雅音为准,继承了唐宋音韵系统,这是明太祖兴复华夏的复古举措之一。它的守旧造成了韵书所记录的音与北方实际音之间的不同。朝鲜的编撰者也发现了这个问题,于是他们用正音和俗音两套系统记录汉字音。这种方式后来成为传统,一直传承下来,以致后续的韵书和其他译书普遍沿用这种注音方式。

2. 《四声通攷》与《四声通解》

《洪武正韵译训》共十卷,篇幅过大不便于使用,于是世宗又命申叔舟等人着手编撰简易版韵书《四声通攷》,但该韵书并没有留存下来。1517年崔世珍编撰崭新的汉韩对音韵书《四声通解》,对《洪武正韵》所收汉字进行归类,先按字母顺序排列,再按平上去入四声进行排序,对每个汉字用训民正音做了注音。崔世珍在保留正俗音的基础上,根据自己观察到的16世纪中国北方音对个别汉字增加了“今俗音”,并且为了更准确地标注汉

收稿日期:2020-06-03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朝鲜朝时期‘类解’类文献整理与近代汉语词汇研究”(20BYY133)

作者简介:全香兰(1971—),女,吉林延吉人,文学博士,鲁东大学国际教育学院副教授、东北亚研究院兼职研究员。

语语音还创造了“国俗撰字之法”^[2]。《四声通解》对汉字的解释也比以前细致。

韵书并不是司译院外语教育的公示教材,但字音是外语学习的首要内容,而且《老乞大》等会话教材、《译语类解》等辞书的注音体系及具体音值都离不开这些韵书,是汉语学习必备的知识。

(二)直解类

直解是用白话文译释经书的一种方式,即直接解释。朝鲜王朝时期的直解类教材有《鲁斋大学》《孝经直解》《直解小学》《训世评话》等^[3]³⁵⁷。前三种分别是对中国经典《大学》《孝经》《小学》的解释,《训世评话》则从中国和朝鲜的经典古籍中选取部分文章结集而成。

1.《鲁斋大学》

《鲁斋大学》一名《大学直解》,是元代的许衡用白话文翻译的《大学》。许衡(1209-1281),字仲平,号鲁斋,是元代著名理学家、政治家。蒙古宪宗四年(1254年)忽必烈出王秦中,任命许衡为京兆提学。忽必烈即位后,又任许衡为国子祭酒,总揽全国教学。许衡博学多才,一生以教为乐,著作颇丰,有《小学大义》《大学要略》《大学直解》《中庸直解》等,后人收入《鲁斋遗书》,后又收进《四库全书》。许衡的《大学直解》不仅对《大学》进行了解释,同时还附上了个人的观点。

2.《孝经直解》

《孝经直解》也是成书于元代,作者贯云石(1286-1324)为维吾尔族人,出身于高昌回鹘畏吾人贵胄。贯云石做过翰林学士,深受汉族的思想与文学的影响,他善作散曲,是元代有名的散曲作家、诗人。《孝经直解》刊印于1308年,贯云石在序文中表示该书的编撰受到鲁斋的影响,但从直解中可以看到二者之间还是有一定的区别。与许衡的《鲁斋大学》不同,贯云石的《孝经直解》忠实于原文,只对原文进行解释。

3.《直解小学》

《直解小学》成书年代不详,作者为偁长寿(1340-1399),高昌回鹘人,维吾尔族人,诗人,随父入高丽。偁长寿在高丽备受重用,被加封为燕山府院君。明朝建立后,偁长寿因通晓汉语,先后8次派往明朝出使。《世宗实录》卷93世宗23年8月乙亥条记载,“判三司事偁长寿乃以华语解释小学名曰直解以传诸后”,可见该书是用汉文解释了朱熹的《小学》。据历史记载,世宗于1434年曾经派李边、金何到辽东找许福、郭望、刘进等

学者核实《直解小学》,郭望曰:“若将此书教训子弟即与华音无异。”^[4]⁹⁵

朝鲜王朝初期,《直解小学》与《老乞大》《朴通事》一同被视为重要的汉语教材。据《经国大典》(1485年)记载,该书被指定为译科初试的讲书之一。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直解小学》因不能真实地反映当时的汉语,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对此也有一段记载,1483年(成宗14年)九月,中国使臣葛贵谈到:“(《直解小学》)反译甚好而间有古谈不合时用且不是官话无人认听。”^[4]⁹⁵于是在《续大典》(1746年)中《直解小学》已被《伍伦全备记》所替代。《直解小学》虽然是当年非常重要的译书,但由于现已失传,我们只能从书目和史料记载猜测其主要内容,具体情况不详。

4.《训世评话》

《训世评话》刊印于1480年,此书与上述三部有所不同,其作者为朝鲜本地汉学学者李边、申叔舟。李边(1391-1473)和申叔舟(1417-1475)是朝鲜王朝初期文臣,著名汉学译学者。《训世评话》在序文中谈到:“我国家设承文司译院,讲肄习读官常习汉音,其为虑至深切矣。但所习者不过直解小学、老乞大、朴通事、前后汉书。然《直解小学》逐节解说,非常用汉语也。《老乞大》《朴通事》多带蒙古之言,非纯汉语,又有商贾庸谈,学者病之。”^[5]序可见,李申二人编撰《训世评话》的主要原因是过去的直解类译书在形式和内容上不适合当年的汉语学习。《训世评话》所收的文章主要来自中国古籍,少量来自朝鲜古籍与传说,文章的内容反映传统儒教思想——忠、孝、仁、义。

从以上直解类译书的编撰情况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个共同的特点,编撰者皆为两种语言文化的接触者。许衡是汉人但深受忽必烈的重用,任集贤殿大学士兼国子祭酒,在兼管太学间编写《大学直解》等课本教授汉蒙弟子。贯云石和偁长寿虽皆为维吾尔族人,但对汉文汉文化有很深的造诣。李边和申叔舟是朝鲜学者,是著名的汉学家。也许这种特殊经历使他们在编写时更能从学习者的角度考虑问题,能够准确地把握学习者的难点,使得这些教材在朝鲜半岛广受欢迎。

(三)会话类

朝鲜王朝时期翻译机关分为承文院和司译院,承文院负责汉吏文等文书的翻译,司译院负责培养口译人才,但后来二者逐渐趋于统一。司译

院讲究实用,注重口语训练,主要的会话教材为《老乞大》《朴通事》,这两套书为了与时代同步不断被翻译、补充和修订,给后世留下了宝贵的语言变迁史料。会话类译书除了这两套会话本,还有《伍伦全备谚解》《华音启蒙谚解》等译书,但其影响力远逊于前两本。

1.《老乞大》谚解本

《老乞大》是实用汉语会话学习用书,记述了几个高丽商人到中国经商,途中遇到一中国商人后结伴同行的经历,内容围绕旅行途中涉及到的旅程、买卖、医药、住宿、饮食、宴会等话题进行。现存最早的《老乞大》是1998年发现的,为了与《新本老乞大》加以区分,叫做《旧本老乞大》,刊行时间推测为高丽时期,其内容反映了元代的汉语。起初《老乞大》是用纯汉语写成,后来陆续刊印谚解本,即用韩文翻译的版本。《老乞大》相关现存谚解版译书主要有《翻译老乞大》(1515年)、《老乞大谚解》(1670年)、《老乞大新释谚解》(1761年)、《重刊老乞大谚解》(1795年)等。因刊印年代不同,不同版本的文本内容有所调整,不经意间保留了汉韩两种语言在词汇、语法、音韵等方面的演变信息,为元明清时期的语言变迁研究提供了真实的语料。

2.《朴通事》谚解本

《朴通事》被称为高级会话教材,全书用对话或一人叙述的方式,话题涉及到中国的风俗、风物、娱乐、农业、手工业、骑射、丧婚、宗教等主题。《朴通事》的字数约比《老乞大》多三分之一,分成上、中、下三卷。现存的朴通事相关谚解译书有《翻译朴通事》(1515年)、《朴通事谚解》(1677年)、《朴通事新释谚解》(1765年)。

从《老乞大》《朴通事》繁多的不同版本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它们在朝鲜半岛的影响力。这两套教材注重口语,通过对话或叙述的方式介绍中朝两国贸易及风俗的方方面面,使语言教学与文化教学融为一体。

朝鲜时期的译官分不同层次,一等为通事,二等为押物、押马,三等为打角夫。通事再分为堂上译官和堂下译官。从这些译官的名称我们可以了解到第二等和第三等译官主要服务于商业贸易。可见《老乞大》《朴通事》安排的诸多场景就是出于现实实用。

3.《伍伦全备谚解》

《伍伦全备谚解》又叫《伍伦全备记谚解》,刊

印时间为1721年。《伍伦全备记》是明代丘濬创作的传奇剧本,主要宣扬儒家五伦观念和忠孝思想。司译院把它当做汉语教材引进,并用谚文进行翻译,以此替换了朝鲜王朝初期的译书《直解小学》。谚解本对原著作了一些调整,删减一些戏曲所特有的成分。

《伍伦全备谚解》共8卷5册,木刊本,现存于奎章阁。该书的谚解经历了一番周折,1696年(肃宗22年)司译院着手进行谚解,但以失败告终。1709年教海厅再次尝试对该书进行谚解工作,但仍未实现,后来在领议政(朝鲜王朝时期议政府正一品最高官职)金昌集鼓励之下此书才得以修订补充,于1720年完稿。《伍伦全备谚解》的成书历经24年,校修者多达10多人,谚解中引用的书目达234种^[1],可见司译院为此书所下功夫之深。通过这一过程我们可以看到司译院对谚解的谨慎态度,同时也从一个侧面反映谚解工作本身的艰辛。尽管该书的谚解工作历经坎坷,但其使用却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因缺乏实用性很快被其他教材所取代。

4.《华音启蒙谚解》

随着时间的推移,《老乞大》《朴通事》《译语类解》等译书所记录的华音逐渐脱离实际读音,这一问题引起了司译院的重视。于是1883年汉学译官李应宪编撰出《华音启蒙谚解》,该书以19世纪后半期燕京语为版本,采用简答体的方式收录了纯白话文。全书分上下两册,下册后面还附上了千字文、百家姓、天干地支、二十八宿、数字等的汉语音,并用谚文加注。然而,该书没维持多长时间,1894年日本发动甲午战争,在日本的干预下朝鲜与清朝脱离藩属关系,开始实行甲午改革,汉语学习从此中断。

自从有了谚文(韩文),相继出现大量的谚解类译书,解决了语言障碍带来的困难。现存的会话类教材大部分是谚解本。从学习者的角度看,谚解本更容易被当地人接受和理解。

(四)辞书类

学习一门外语工具书是不可或缺的部分。在朝鲜半岛起初字书是汉语学习的主要工具书,但是随着复合词的大量出现,仅靠字义已经很难解释其义,辞书的编撰势在必行,《语录解》等是早期的尝试。司译院院试取才中规定的辞书类译书主要有《老乞大朴通事集览》《译语类解》《译语类解补》。

1.《老乞大朴通事集览》

《老乞大朴通事集览》，又叫“老朴集览”，是《老乞大》《朴通事》专用学习词典，由崔世珍编撰而成。据崔世珍的《四声通解》序，该译书的出刊应与《翻译老乞大》《翻译朴通事》同步，刊印时间推测为1515年。《老朴集览》内容由凡例、单字解、累字解、老乞大集览上下、朴通事集览上中下构成，共57叶纸。该书在“单字解”对疑难汉字进行注音注释，并举例说明，还增加了语法解释。在“累字解”则对重要的词语以及地名等固有名词提供汉文注释或谚文翻译。在集览部分，对从《老乞大》《朴通事》当中挑拣出的798个词进行了注释。

2.《译语类解》

《译语类解》是由司译院的汉学译官慎以行、金敬俊、金指南等编撰的汉朝对译词汇集。该书为木刊本，刊印时间为1690年，主要收录17世纪的汉语白话词汇，全书分上下两卷，内容分62门类，共收录4690条词语。该译书与《老乞大》《朴通事》一同被收为译科初试的三大背讲科目^[6]。《译语类解》不仅收录词，也收录大量的短语，反

映当年汉语学习追求实用的特点。《译语类解》后来成为汉学以外的其他外语类解类词汇集的模板，如后编的《蒙语类解》《同文类解》《倭语类解》都借鉴了《译语类解》的体例。

3.《译语类解补》

《译语类解补》是奉司译院都提调金尚喆之命刊行的，编撰者为金弘喆。金弘喆是《译语类解》编撰者之一金指南的孙子。该文献的刊行时间为1775年，共一册，收录2297条词语。体例与《译语类解》相同，遵循《译语类解》的62个门类，每个门类都补充了新词。《译语类解补》与《译语类解》时隔近一百年，因此在音韵、文字及词汇方面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变化。

以上我们分四个类对朝鲜王朝时期的主要译书进行了介绍和分析。在这一历史阶段通过不同途径编撰的译书还有很多，但本文的介绍仅限于《通文馆志》《经国大典》《续大典》中有记录的院试取才用的教材。自从有了考试制度，与其他书籍相比考试用书的重要性和影响力往往占据着决定性的优势，这一点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基本不变。这些译书用表格的形式整理如下：

表1 朝鲜王朝时期汉学译书一览表

类型	译书名	刊印时间	编者	备注
韵书类	洪武正韵译训	1455年	申叔舟等	失传
	四声通攷	不详	申叔舟等	
	四声通解	1517年	崔世珍	
直解类	鲁斋大学(大学直解)	13世纪	许衡	失传
	孝经直解	1308年	贯云石	
	直解小学	14世纪	倪长寿	
	训世评话	1480年	李边、申叔舟	
会话类	翻译老乞大	1515年	崔世珍	
	翻译朴通事	1515年	崔世珍	
	老乞大谚解	1670年	郑太和	
	朴通事谚解	1677年	边暹、朴世华等12人	
	老乞大谚解(平安监营本)	1745年	朴道贯	
	老乞大新释谚解	1761年	金昌祚、边宪、李天埴等11人	
	朴通事新释谚解	1765年	金昌祚	
	重刊老乞大谚解	1795年	李洙、洪宅福、崔城	
	伍伦全备谚解	1721年	原作者:明·丘濬	
华音启蒙谚解	1883年	李应宪		
辞书类	老乞大朴通事集览	1515年	崔世珍	
	译语类解	1682年	慎以行、金敬俊、金指南	
	译语类解补	1775年	金弘喆	

二、朝鲜王朝时期汉学译书的特点

据历史记载，朝鲜半岛对译官的外语教育始

于新罗时期，但是设置专门外语教育机构则是在高丽时期，叫通文馆。高丽忠烈王2年，通文馆改名为司译院，从此司译院的名称一直沿用下来，直

到1894年的甲午改革。随着国际关系的逐渐加深,朝鲜王朝急需大量的译官,为此司译院调整了相应的教学目标,而教学目标的改变又带来了教育内容的调整,最后体现在译书的编撰与选定。纵观译书的内容及其发展历史,我们可以总结出以下三个方面的特点。

(一)注重口语

从译书的内容和性质来看,司译院的汉语教育中口语会话是重中之重。朝鲜王朝时期非常重视口语教学,当时外语叫做“译语”,从事译学的人叫“译学人”“译学者”,而从事口头翻译的人叫“译语之人”“译语人”“译者”“舌人”“舌者”“象胥”“译官”“通事”等。而且从堂上译官、堂下译官、押物、押马、打角夫等通事的名称中我们可以看到口头翻译的需求是多方面的。《老乞大》《朴通事》是会话类教材,而且从这些书的主要教学内容来看,通商贸易是当时教授外语的主要目的之一。为了和中国取得广泛领域的交流与沟通,朝鲜王朝不得不重视口译人才的培养。为了达到教学目标,在平时的教学中他们要求学生必须把课文内容倒背如流。《老乞大》的对话中就有一段关于教学的内容:

到晚,师傅前撤签背念书。背过的,师傅与免帖一个;若背不过时,教当直的学生背起,打三下。

怎的是撤签背念书?怎的是免帖?

每一个竹签上写着一个学生的姓名。众学生的姓名都这般写着,一个签筒儿里盛着。教当直的学生将签筒来摇动,内中撤一个,撤着谁的,便着那人背书。背念过的,师傅与免帖一个。那免帖上写着“免打三下”,师傅上头画着花押。若再撤签试不过,将出免帖来毁了,便将功折过免了打。若无免帖,定然吃打三下。^{[7]3a-4b}

从以上叙述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汉语教学比较重视口语训练。这种重视口语的教学方法与当年的考试制度也有直接关系。朝鲜王朝有严格的译官考试制度,主要考试形式是讲书、译语、写字。其中讲书再分为临文和背讲。临文指根据经书回答问题的考试方式,背讲便是按要求背诵会话教材或根据提问回答问题^[8]。总之,为了提高口语表达能力,他们用取才制度和考试方式鼓励学生重视口语,译书的内容和题材也体现了这种特点。

(二)注重时代性

司译院采用的译书经历了多次修订,从教材的修订与更新,我们可以看到朝鲜王朝非常注重时代性。这其实与口译的性质有直接关系。与书面语不同,口语是活跃的、生动的,靠声音传达意思,因此汉语音韵的变化及官话转移都会影响到口头交际。《老乞大》《朴通事》经历过多次修订,《直解小学》也因内容不适被《伍伦全备》替换,这种变化反映了朝鲜王朝汉语教育为顺应时代而做出的努力。

学一门语言掌握正确的读音是第一步,因此汉字读音的转写始终受到朝廷的重视。早在15世纪为了审定《洪武正韵》,世宗王派申叔舟、成三问等人赴中国辽东核实实际音,因此《洪武正韵译训》对汉字音的记录分两套,一是正音,二是俗音,俗音便是当时考察到中国北方的实际读音。以此为传统,后来的译书都标有正俗音两套注音系统。《老乞大》《朴通事》《译语类解》的谚解部分等都标有正音与俗音。《译语类解》的部分词汇还补注其他方言的读音,努力做到与中国同步。

除了派人到中国找汉人专家审定读音,承文院还专门设“质正官”,每次派使臣前往中国时让其随行,负责了解中国的音韵及制度的变化。根据实地考察上报汉语音韵情况是质正官的主要任务之一,司译院便根据汇报对译书进行一定的调整。

为了保证译书的准确性,朝鲜王朝任用不少归化的中国籍人士,《直解小学》的作者偲长寿便是朝鲜王朝初期比较典型的中国籍学者,除此之外历史上还有唐诚、曹崇德、徐世英、张显等诸多汉人学者。为了提高口语教学,肃宗八年(1682年)朝鲜王朝还设置汉语偶语厅,任用汉人文可尚、郑先甲为教授,培育了不少学生,效果显著。此二人也负责审阅译书,《译语类解》的审稿便是由他们负责完成。由于汉人教师的参与,朝鲜王朝译书的编撰及汉语教学尽可能做到不脱离现实,译书也经过反复修订努力跟上时代。

(三)逐步本土化的趋势

朝鲜王朝前期的汉学译书主要依赖于中国的蒙学书,一开始直接引进中国书籍,后来逐渐编撰出适合自己的本土化教材。比如,《老乞大》《朴通事》的内容主要涉及到高丽人,涉及到的物件及话题皆与本土有关。《伍伦全备记》本是中国戏剧,拿到朝鲜半岛后去掉戏剧成分,重新编撰成会话书。《华音启蒙谚解》也是由朝鲜译官李应

究以 19 世纪后半期燕京语为基础编写而成。再后来不合本土的教材逐渐被淘汰,《训世评话》《译语类解》等由朝鲜人编写的译书相继问世。

郑光把朝鲜王朝时期的译书分为三个时期^{[9]12}:

朝鲜王朝前期——草创期——以《经国大典》记录为准(世宗 12 年之前)

朝鲜王朝中期——稳定期——以《续大典》记录为准(壬辰、丙子二乱之后)

朝鲜王朝后期——改订、增补修整期——以《大典通编》为准(英祖、正祖之后)

从整体考察,朝鲜王朝前期译书基本直接采用中国的蒙学书,并以汉学为中心。到了中期开始强调实用性,会话类教材受到重视,而且司译院开始自己研发编撰译书。这个时期《译语类解》等“类解”类辞书因其实用性受到重视,倭学和清学也开始受到关注。到了后期,司译院开始对现有译书进行修订和增补,出现大量的以“新释”“改修”“重刊”“补”等方式的修订本,并且到了后期所有的译书都附上了谚文注音和注解,本土化的气息更加浓厚。

三、朝鲜王朝时期汉学译书的价值

(一) 培育大批译官,造就出色译学家

培养译官是朝鲜王朝司译院的主要任务之一,而译书是培养译官的主要教材。在这些译书的培育下朝鲜王朝出现大量译官,为中朝两国的交流做出莫大的贡献。朝鲜王朝每年往中国定期派遣 4 次使臣:冬至使、正朝使、圣节使、千秋使。平时还不定期派遣奏请使、进贺使、陈慰使、进香使等。这类赴京使前往中国必有译官随行。据丁未十月二十日燕行录(正祖 11 年,1787 年)记载,这一次的燕行共出使 324 人,其中有身份的主要人员有正史 1 人、副使 1 人、书状官 1 人、军官 8 人、御医写画日官 5 人,译官 21 人。而且每位译官都配备 3 至 4 名马夫,有些译官还配备一名奴子^{[4]74-79}。从这些出行人员的人数分配及待遇中,我们可以看到当年朝鲜王朝对译官的需求与重视。这些译官往返于中朝两国,在两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译书的编撰也造就了不少出色的译学家。编撰译书不仅需要懂得两种语言,还要具备深厚的语言学知识。两种语言文字的对比促使他们去探索语言的原理,最终成就了诸多译学专家。与译

官不同,译学家的身份皆为文臣出身,朝鲜王朝有名的汉学译学家有李边、金何、成三问、申叔舟、李昌臣、任士洪、金自贞、崔世珍、金启、李准等^{[10]57-105},他们主要从事译书的编撰及译官的培养,同时承担外交文书的翻译、起草以及审阅等工作,有时还承担外交使臣的口头翻译工作^{[11]234-239}。在诸多译学家当中最有成就的为崔世珍,他编撰的译书有《翻译老乞大》《翻译朴通事》《老朴集览》《四声通解》《韵会玉篇》《吏文辑览》《训蒙字会》等,其中《四声通解》为其代表作,该译书对朝鲜后期的汉语译学家以及汉语音韵学研究影响深远。

(二) 为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提供参考

随着中国影响力的扩大,针对外国学生的汉语教学越来越得到重视。译书作为 15 世纪至 19 世纪的汉语学习教材呈现出当年汉语学习的特点及模式,给我们提供了一定的参考和借鉴。比如,《老乞大》《朴通事》等会话类教材所体现出的交际性、实用性、文化性等特点为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口语教材编写以及口语教学都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除了会话类教材,译书中还有辞书类教材。《译语类解》等辞书作为汉语学习用辅助材料,在收词、编排、释义、分类等方面体现出自己的特点。比如,学习辞书的收词原则、编排所遵循的同义优先反义跟随原则、词目排列遵循的认知规律、释义采取的对译原则以及一词一音一义原则等,都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和特殊性。这种经验无疑给现时代外向型汉语学习词典的编撰提供很好的参考,而这方面的研究国内尚未展开。

过去我们面向外国人的汉语教学多半从汉语的特点出发,探讨汉语的习得规律。研究者的中国人身份决定了研究的倾向,这是难免的。随着汉语国别化教学的深入,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以及外国学者开始关注学习者的身份及角度。不同母语持有者在学习汉语的时候其接受能力和学习难点是不同的,学习规律也是不同的。因此如何从第二语言学习者的角度审视汉语规律与汉语习得,这给国内学者带来很大的挑战。朝鲜王朝编撰的译书作为汉语学习的载体,体现出外族人在长期的汉语学习当中积累的智慧,无疑为我们当今的国别化汉语教学提供有益的参考。

(三) 留下宝贵的语言资料

译书的编撰是为了培养译官,因此译书的第一个特点便是注重口语。由于这一特点,朝鲜王

朝时期译书保留着大量的汉语口语,主要是元代以来的汉语口语,这为中国的近代汉语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语料^[12]。由于中国长期以来书面语与口语脱离,留存下来的口语文献资料相当有限,而朝鲜王朝时期的译书作为汉语会话类教材保留了丰富的相关语料。尤其是为了做到与时俱进,这些译书经历了多次修订和增补,不同时间段不同版本的共存使这些译书无意间记录了汉语发展变化的轨迹,为近代汉语的动态历史研究提供了可能^[13]。

译书不仅为近代汉语研究提供宝贵的资料,对韩国近代语言的历史发展研究也有重大意义。朝鲜王朝是朝鲜半岛文字创制、发展,并逐渐成熟的主要阶段。为了便于学习汉语,司译院编撰大量的谚解本,即用谚文注音、注释并翻译汉语文本。这些谚解本译书为研究15世纪以来语言文字的发展和使用时提供了不可多得资料。资料所呈现的谚文标记的更替与变化有助于考察韩国近代的音韵、文字以及词汇的变化,也有助于考察其在语法上的发展变化。两种语言并存的语料为两国的语言研究提供了莫大的便利。

文中介绍的译书主要是译科出题指定教材,除了这些教材,朝鲜王朝时期编撰的译书还有很多,但因其影响力相对来说不如考试用教材,本文从略。朝鲜王朝时期的汉学译书编撰年代久远,过去曾为两国交流起了重要的作用,而如今它对

语言的历时研究及汉语国际教育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目前国内对会话类译书的研究比较活跃,对其他类译书的关注较少,相关研究需要我们继续梳理和挖掘。

参考文献:

- [1] 韩国民族文化百科辞典[Z/OL]. <https://encykorea.aks.ac.kr/>.
- [2] 金基石. 韩国汉语教育史论纲[J]. 东疆学刊, 2004(1).
- [3] 梁伍镇. 汉学书研究[M]. 首尔:博文社,2010.
- [4] 姜信沅. 韩国的译学[M]. 首尔:首尔大学校出版部,2000.
- [5] 李边. 训世评话(影印)[M]. 首尔:太学社,1998.
- [6] 林东锡. 朝鲜译学考[D]. 台北:台湾师范大学,1972.
- [7] 老乞大谚解(影印本)[M]. 首尔:亚细亚文化社,1973.
- [8] 金基石. 韩国李朝时期的汉语教育及其特点[J]. 汉语学习,2005(5).
- [9] 郑光. 译学书研究[M]. 首尔:J&C,2002.
- [10] 姜信沅. 李朝时代的译学政策与译学者[M]. 首尔:塔出版社,1978.
- [11] 李甄洙. 朝鲜朝的语文政策研究[M]. 首尔:开文社,1979.
- [12] 刘春兰. 朝鲜时代汉语教科书研究综述[J]. 汉语学习,2011(4).
- [13] 岳辉. 朝鲜时代汉语官话教科书研究[D]. 长春:吉林大学,2008.

On the Translated Books of Sinology in the Korean Dynasty

QUAN Xianglan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Northeast Asia Research Institute, Ludong University, Yantai 264039, China)

Abstract: The translated books in South Korea specially refer to 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 books written in the Korean Dynasty. The paper focuses on the types of translated books of sinology and the main representative books in this period, and summarizes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values on this basis. The translated books of sinology not only retain the use condition of Chinese vernacular since the Yuan Dynasty, but also reflect the educational situation of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on the Korean Peninsula. The translated books are the rare research material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both historical linguistics and international Chinese education.

Key words: translated book; the Korean Dynasty; Chinese education

(责任编辑 合壹)